

乱花迷眼:探索中的高考改革

■本报记者 韩理

近日,关于“2016年江苏高考将推行新方案”的传言和江苏省教育厅的“辟谣”回应,恐怕是十一长假归来后最引人注意的一条教育新闻了。

在所谓“传言”中,江苏省高考“小综合”将重新启用,英语拟不再计入总分等多种说法不一。而官方则回应,新高考方案尚在酝酿,“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听信当前关于高考方案的不实传闻,以免被误导”。

这一新闻不仅在江苏引起了学生、老师、家长的广泛关注,其他省份和地区的媒体也纷纷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讨论本区域高考改革的可能性。

民间传言,官方辟谣,网络热议。热热闹闹的场面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于高考的关心,更是我国高考改革的缓慢探索。

事实上,各省(市)高考改革的各种新闻和讨论层出不穷,一时间,可谓“乱花迷人眼”。而在一派纷乱景象之下,高考改革的步伐又将如何迈出呢?

说法遭“辟谣”

一个月多前,高三学生的新学期才开始没多久,明年即将参加高考的浙江考生们就得到了一个新消息:高考题目可能来自全社会了。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称,考试院决定面向社会开放征集学业水平考试、高考试题,逐步建设学业水平考试、高考命题题库。这意味着将来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试卷中,有可能出现来自社会人士集思广益的试题。《中国教育报》9月11日

事实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开征题的科目包括学业水平考试,高考的语文、数学(文/理)、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通用技术、信息技术学科,即涵盖了学生高中所学的全部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会考”,但因重要性和影响力较弱,公众的注意力基本都放在了高考上。

尽管“2016年江苏高考将推行新方案”传闻被江苏省教育厅否认,但“新方案”新闻刚出之时,公众还是倾向于相信的,亦在此基础上广泛讨论。而2008年至今,江苏省高考采用的“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等级+综合评价”三位一体的模式。民间对于这一做法的褒贬不一,在高考改革的期待情绪中终于迎来的新方案不料又遭“辟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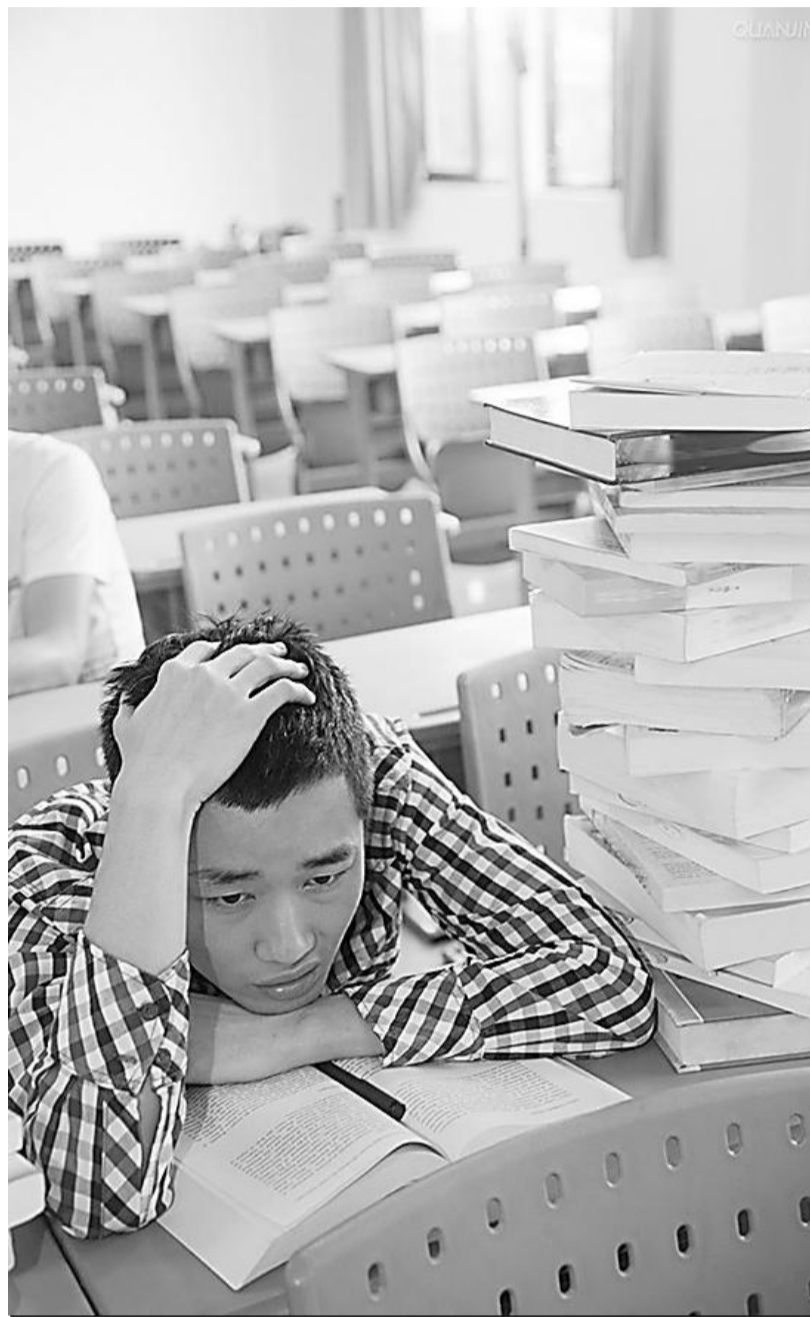
就在本周一上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过程中,专家组已经进行多轮的讨论,但截至目前尚无具体方案出炉。续梅表示,国家层面政策出台后,有关省份会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高考改革细化方案。

专家建议,在关于高考改革的种种消息面前,最可取的做法应该是审慎分析、冷静对待。

公开征题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向社会公开征集高考题目”的消息一出,就迅速在网络平台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不仅浙江本地媒体关注,不少其他省份和地区的网友也加入了讨论。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一行为被网友戏称为“广发英雄帖”,集思广益,是十分“接地气”的行为。甚至有人笑称:“说不定你上街偶遇的美女就是你高考题目的出题者。”

当然,高考命题不是公众想象的那样简单。征集试题内容的范围也很明确:“不超出浙江省2012年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后相应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高考内容(含自选模块)范围,符合各学科《浙江省普通高中教学指导意见》(2012版)所



“高考改革需要权衡当前制度的利与弊,全面分析后兴利除弊,考虑民间呼声与反响,慎重论证可行性。即使是借鉴国外经验,也要注意配套改革。”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

规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虽然是向社会征题,但能对考试范围有确切把握才能出好题目,这一隐含前提已经对那些跃跃欲试的“英雄好汉”们设立了一个门槛。

浙江省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高中部总务主任纪义庆告诉记者,“公开征题”会促使老师在命题研究方面下功夫,加强试题研究,在专业方面会有所加深,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高三复习效率,“主要是对一些重点中学的影响较大。”而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向社会征集题目与否对他们的学习并没有直接关联。

按照文件来看,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希望通过征题工作物色优秀教师,逐步建立学科专家队伍。“征题工作中表现优秀的教师,进入学业水平考试、高考骨干命题教师库。研磨试题过程中表现优秀的教师,进入骨干命题专家库。分析评估试题过程中表现优秀的教师,进入骨干命题专家库。”对此,纪义庆表示,中学教师受专业和视野限制,一般可能会在学业水平考试和命题以及分析评估试题方面有所作为。

“学业水平考试现在明显难度加大,A等比例

有所下降,将来成为部分自主招生学校的主要依据。”纪义庆补充道。

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是大学选拔区分人才的主要手段,而大学的思维和判断毕竟跟中学有所差异,因此,纪义庆认为,如果大学教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补充题目进入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身具高考亲历者与如今的学生家长双重身份的姜女士则对记者直言:“在应试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公开征题只是改革皮毛而已。”在她看来,学生仍是要进行应试训练,这是不会变的。

弱化英语

“此消息和方案如真,真好!降低英语刚性要求,让考生和学校各取所需,扩大选择权是进步。”这是前教育部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听说江苏高考新方案“传言”时的第一反应。

尽管随后江苏省教育厅对诸如英语“一年两考”等新方案的传言予以否认,但这一改革思路还是被公众热议。那么,我们不妨就先“传言”论

“传言”一番。

传言所谓的“英语拟不计入总分”,是指英语一年举行两次等级考试,以等级计形式计入高考成绩,高校在录取时将英语等级提出要求。《扬子晚报》10月10日“不计入总分”看起来的确是降低了英语刚性要求,因此,如王旭明一般表示赞赏者大有人在。然而,也有专家对此有不同声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达了对这种方案的担心,称“恐不是福音是悲剧”。

熊丙奇认为,在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之下,英语一年两考并不能减轻学生的焦虑和负担。传言中的新方案很可能让一些学生因英语一门不佳,而失去进入名校的机会,也就是说,英语单科成绩不好的偏科同学失去了通过其他科目的表现弥补不足的机会。换言之,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提高了对英语的要求。与此同时,这样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英语教学差距。

冷静下来分析可能弊大于利的方案,为什么更多人的反应是第一时间拍手称好呢?这与现行教育体制中英语过高的地位有关。

恢复高考三十年来,英语在高考中的地位是经历了一番变化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亚群告诉记者,头三年英语不是高考必考科目,只是作为重点大学招生参考,但不计入高考录取总分。之后,英语在高考中的地位逐年上升,权重不断增加,取得了与语文、数学平起平坐的地位。高考对英语的重视和强调程度,现在看来,“是有些过了”。

张亚群谈到,近些年来,不少大学生的中文写作水平明显下降,往往词不达意。他说:“母语都掌握不好,还怎么能学好外语?”

要慎重论证

关于英语在高考中降低分值的想法,不只是江苏省一家,福建省也有所考虑。前几年就有所耳闻,但实际上很难实行。张亚群说:“降低高考英语分值需要跟社会沟通,任何关于高考的改革方案都必须慎重论证。”

在采访中,张亚群多次强调高考改革需要“论证”,综合说来,就是要根据教育部此前所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及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

媒体公布的江苏省教育厅回复文件显示,从今年3月份以来,江苏省教育厅的调研工作包括“先后召开多个座谈会,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听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考部门、中学和高等学校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搜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看来,对于教育部门来说,论证是做到了,那究竟有没有贯彻《纲要》呢?

在熊丙奇看来,显然没有。他认为,各地的改革方案都基于原有的录取制度不变的前提,“说到底,这是高考改革的歪门邪道”,没有贯彻《纲要》中的招生考试相对分离、政府宏观管理的要求。熊丙奇直言:“不是所有教改,都是有比无好。方向错误的改革,只会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

“简而言之,高考改革需要权衡当前制度的利与弊,全面分析后兴利除弊,考虑民间呼声与反响,慎重论证可行性。即使是借鉴国外经验,也要注意配套改革。”张亚群最后总结道。

中国大学评论

北大本可以更优雅

■尤小立

近日,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从香港大学文学院休学,准备通过一年复读、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追求纯粹的国学”。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港大和北大校方都作出了回应。相比之下,港大的回应明显更规范。虽然从他们的回应中不难读出无限的惋惜,但一五一十,有问必答,精确务实,又不至于对刘丁宁个人选择的尊重。

再来看北大的回应。实际上,北大的新闻发言人和中文系的领导面对媒体说了那么多,只有一句有实质内容的话,即刘丁宁“想读北大中文系,必须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北大不会直接录取”。可是,如果认真地想想这句回应要表达的意思,却十分模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北大拒绝录取刘丁宁,也就是说,刘丁宁现在转学北大是不可能的,必须参加明年的高考,等分数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才予以考虑。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北大的大门并未关上,因为“不会直接录取”,还可以“间接录取”,比如签个意向书,明年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也可以搞一个能力水平综合测验,然后转入北大。

所谓“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似乎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如刘丁宁写一份正式的转学申请,盖上香港大学的公章,直接递交给北大有关部门,这算不算“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如果算,那么,北大也有可能同意刘丁宁同学的转学了?

进一步看,这句话的模棱两可之处就在于“正常的途径”和“(正常的)程序”上。因为北大的“正常的途径”和“(正常的)程序”是什么,非一般人所能知晓。北大校方不加以明确的解释,引发公众“官僚主义”的联想自然在所难免。

不用去责怪公众。现实中,对于“程序”的滥用,已经让“程序”的意义发生了变异。“程序”不再是一道门而成了一堵墙。比如我们感冒去医院,走“程序”的话,可能就要先去拍个片,证明不是肺炎;如果岁数大一点,还可能被要求去做个心电图,……结果走了一套“程序”,最后只开几片“白加黑”;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这等于是在绕着墙,白走了一大圈。

如果北大也这样将本身不合理的“程序”坚持到底,砌墙而不是开门,刘丁宁的前途可能因此耽误了。

其实,爱护一个人才或者有着潜质的青年,最怕就是给他(或她)面前砌一堵又一堵墙,以“磨难”的方式提供所谓“财富”。虽然真金是不怕火炼的,但现实中,制造“磨难”的人不甚光明的心理和手段,却是不值得仿效和提倡的。

走程序有正常和例外之分,也有古板和灵活之别。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主张破坏规则,按程序进行无可厚非。但规则或程序有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即使有程序和规则,也不能以现有程序或规则而一拒之之,或内外有别,只跟当事人解释,不回应公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一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后。

以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途径”不畅,就应该通而畅之,“程序”不完善,就应该完而善之。这样的探索,对北大何难之有?北大不破冰,孰来破冰?

北大历史上是有破格先例的。1916年,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完元决疑论》聘任只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为讲师,传为历史佳话。就刘丁宁来说,她本身是具备令北大破格录取的条件。在这里,状元成才率不应成为障碍。因为按照现有大学录取标准,高考成绩仍是相对比较公正的。假设当初这位考生没有被港大挖走,而是径直报考北大,北大拒绝吗?

另外,刘丁宁进入香港大学学习才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有些大学的新生还刚刚完成军训,正式的课程教学还未开始。因此,学习上不存在跟不上的问题,生活上更不存在不适应。这时候,再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和程序”的理由绕圈子,就显得苍白而没有人情味了。

特事特办需要智慧,但智慧是由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本来北大领导完全可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相当的智慧。比如组织中文系的老师集体商讨,甚至发起全校师生网上投票。

应该看到,录取刘丁宁,是只会给北大加分,不会减分的。对北大而言,这还不只是重塑形象的问题,更是一次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推动中国大学改革进程的契机。

我们的大学需要智慧,这个智慧需要体现在各个细节之中。笔者更愿意将“智慧”表述成“优雅”。因为有时候“智慧”会被理解成一种策略,进而成为一次性的技巧,而“优雅”更多地体现在非功利性的气质上,是持续性的展现。

我们希望北大以及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一种优雅的意识,并且在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上,渐渐体现出一种优雅。为重新赢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和口碑,也为了给学生树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赵良庆:

地方高校要走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钟华 蒋家平

“地方高校不能办成象牙塔,必须接地气,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近日,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赵良庆教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安农大在长期办学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富民、育人、兴校的大别山道路,凝练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UPEG办学模式,为地方高校的办学模式创新作出了有益探索。

科技扶贫走出“大别山道路”

“安农大是地处农业大省的地方性农业院校,农大人和‘三农’的感情很深。”赵良庆说。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分散在安徽多地办学的系科专业、养殖生产基地,陆续汇集到安徽合肥。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农村还很贫穷落后,为了响应国家科技开发大别山的号召,回到城市的安农人带着科技扶贫的“看家本领”,踏进皖西大别山区。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大山深处,给贫困地区农民送去良种、送去种植养殖技术、送去脱贫致富的希望,走出了立足山区资源,以科技扶贫为目的,帮助大别山区人民发展适度规模的区域性支柱产业“大别山道路”。

“这一时期,农大共有300多名教师参与其中,先后为地方培训学员100多万人次,直接参与和开发了大别山区的6项支柱产业。”赵良庆说,西洋参与宛志沪、板栗与汪柱生、银杏与张良富、水蜜桃与钟家煌、中华猕猴桃与丁世林……大

别山区农民的脱贫致富打上了农大人的深深烙印。

深度融合探索“UPEG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安农大认真总结“大别山道路”的经验,进一步提出科技围绕产业做文章的理念,引导学科团队和各种科技资源向产业聚集,完善了以教授团队为支撑的科技服务体系。与此同时,学校先后与安徽省27个市县政府签订了政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与全省620多家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130多家省级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以及6000多个专业合作社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对农人来说,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不仅要让学生和家长满意,还要让社会满意,也就是要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赵良庆说,近年来,安农大围绕粮食数量安全问题主动请缨,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小麦高产攻关活动”的建议,并组织生产、植物保护等众多团队提供科技支撑,实现了全省小麦5年增产79.7亿斤,累计增加产值65亿元,使得安徽的小麦产量从原先的低于全国平均数发展到现在的总产量全国第四,成为全国粮食高产攻关计划的一面旗帜。

目前,安农大正在致力于安徽“水稻高产”和“玉米振兴”计划,并围绕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组织土壤学等研究团队开展科学研究,已建立了全省耕地地力评价和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为全省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服务。此外,该校还与地方政府合

作,培育了茶叶、中药材、油茶、果蔬、特种水产等40多个县域农业特色产业。

“大学(U)+农业园区(P)+龙头企业(E)+地方政府(G),我们称其为UPEG办学模式。”赵良庆说,这是“大别山道路”在新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的一个新的发展境界,其本质是在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依托、企业为主体、项目平台为纽带的合作平台上,实现开放办学、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

在协同创新中找准办学定位

“投入不足、定位不清,是地方性应用型院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赵良庆说,通过30年左右“大别山道路”的实践,他们深刻认识到,地方高校不能办成象牙塔,一定要接地气,通过人才和技术供给等方式,深度融入和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良性互动和正反馈。

过去,农业产业链很短,而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农业与工业、商业等联手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产业链得以延长。为此,农业发展对产品加工制造、贸易、动植物育种乃至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提出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这使得我们的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上游高科技、下游接地气’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赵良庆说,近年来,安农大的学科建设围绕农业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工程技术学科要与农业学科相结合,不断提升农业科技的学术高度;一方面是

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实际需求,做好应用和社会服务。比如过去更注重提高粮食产量问题,现在还必须关注到粮食质量安全,土壤学等相关学科就必须为此提供科技支撑。

“学校规定新进博士入校后必须在农业园区工作半年,在生产实践中找到科研方向。”赵良庆介绍说,过去,安农大的科研经费中,纵向经费占到80%,而现在来自一线横向课题经费已经占到总经费的40%左右。

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多年轻人不愿意选择农业专业,但实际上农业专业社会需求量非常大。赵良庆介绍,为此,安农大花了很大精力来帮助学生提升专业意识,如邀请知名专家为学生介绍专业发展前景,组织学生到现代农业企业参观体验,让高年级学生进入农业园区和龙头企业开展生产实习等等。

“目的是帮助学生克服传统的农业概念,让学生看到现代农业产业的光明前景,从而增强对农业专业学习的热情和信心。”赵良庆介绍说,学校还与农业龙头企业联合实施“现代农场主培训计划”,让在校大学生学习如何做一名现代农场主,平时上课,节假日进入企业,开展体验式教学。“不仅学生积极性高,企业也非常欢迎这种做法。”

“UPEG”发展模式有效地激发了校内外办学要素的活力和合力,使得学校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也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走上了一条良性的互动发展之路。”赵良庆说。